

党史视角下的“四个意识”

□ 秦真英

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攻坚克难，一路成长，成为当今世界第一大党。回望历史，不难发现，这和中国共产党有着强烈的政治意识、大局观念、维护核心、强调看齐有很大关系。从党史的视角梳理“四个意识”的红色基因，有利于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党的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贯穿党的整个奋斗历程。1921年7月，党的一大把“宣传共产主义”写入党纲，并明确规定入党的前提是“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体现了明确的政治要求和鲜明的政治意识。1929年，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 and 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进一步明确了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方向。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依然高度重视增强党员干部的政治意识，不久就开展整风整党。1955年，毛泽东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深刻指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改革开放后，面对新形势新任务，邓小平指出，“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无论是强调讲政治，还是增强政治意识，主要指政治思想、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方向、政治原则以及政治敏锐性、政治鉴别力等对于所有政治现象的态度、观点和评价。对领导干部而言，必须突出政治

忠诚、政治定力、政治担当、政治能力、政治自律等实践要求。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讲政治是突出的特点和优势。没有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党的团结统一就是一句空话”，“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党的十九大第一次把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强调“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凸显党的政治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在此背景下，强调政治意识具有特殊的意义。

坚持以大局为重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从全局上谋划和推动工作，是我们党的一贯方法，是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成功解决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遇到艰难险阻的宝贵经验。大局意识，主要指统筹国际国内局势、党和国家大势的根本性、全局性的视野高度观察形势、分析问题、谋划发展。

革命年代，针对革命实际，我们党在不同时期都强调各地要着眼革命大局。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部党章指出，“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各组均须执行及宣传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定政策，不得自定政策”，“中央执行委员会未发表意见时，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均不得单独发表意见”，

这是党的历史上大局意识的最初表达。毛泽东说过，“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强调以此为指导的工作方法是，“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邓小平指出，“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眼界要非常开阔，胸襟要非常开阔”。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执行中央命令，不顾疲劳千里跃进大别山，演绎了一段顾全大局佳话，深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赞许。

新时代治国理政任务极其繁重，“强起来”谈何容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处理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牢固树立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自觉从大局看问题，把工作放到大局中去思考、定位、摆布，做到正确认识大局、自觉服从大局、坚决维护大局”“制定各方面决策部署，首先要有正确大局观，站在党和国家大局上想问题、看问题”，“要统筹谋划、通盘考虑各方面因素，兼顾各方面利益，协调各方面关系，明确轻重缓急，使各方面资源发挥最大效用”。这些论断，浸透着历史智慧，指引着工作方向。

领导核心至关重要

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马克思说：“每一个社会

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列宁指出：“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确立坚强的领导核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上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标志。

核心意识，就是全党上下一心，充分认识并积极拥护核心的作用和地位，这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论述，更是被党的历史所验证。1922年党章明确规定，“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这被视作核心意识的早期表达。1935年遵义会议前，党的事业几经挫折，甚至面临失败危险。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没有成熟的党中央。遵义会议后逐渐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全党努力下党的革命事业才不断取得胜利。我国革命历史表明了领导核心的重要性。毛泽东鲜明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与中央领导集体谈话时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仅突出加强党的领导，还高度重视增强全

党的核心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核心意识在实践中的集中体现就是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维护核心，不仅来自党的历史，而且关乎党的未来。

向党中央看齐

中国共产党是高度集中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上的统一、政治上的团结、行动上的一致是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所在。强调增强看齐意识，时刻注意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党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

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特别强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地位，如各地党组织“直接受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挥监督”“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等，就是看齐意识的早期表达。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一致的……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194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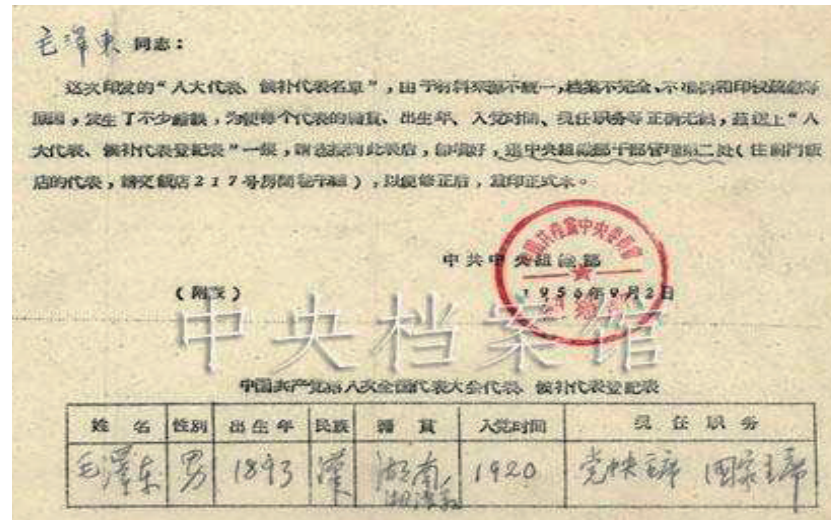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上指出，“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间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指出，要“加强党的领导，反对派性，把毛泽东同志树立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正因如此，我们才屡克时艰，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进入新时代，面临新形势新任务，解决新矛盾新问题，迫切需要全党上下齐心协力，全党增强看齐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经常、主动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经常喊看齐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规律和经验。只有经常喊看齐，只有各级党组织都经常喊看齐，才能时刻警醒、及时纠偏，使全党始终保持整齐昂扬的奋进状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可不进、非进不可的时候。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大”。这需要全党站在历史和现实交会的高度，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自觉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努力前行。



毛泽东的入党时间为何是1920年



毛泽东填写的中共八大代表登记表

□ 程曦敏

今天的中央档案馆保存着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物——毛泽东亲自填写的中共八大代表登记表。在登记表的“入党时间”一栏，上面写的是1920年。中国共产党1921年才成立，为何毛泽东1920年就入党了呢？要弄清楚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回到1920年的历史现场。

实行“呼声革命”“无血革命”

1920年初，毛泽东身处北京，正忙于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张敬尧是皖系军阀，1918年3月就任湖南督军，主政期间，作恶多端，民怨沸腾。毛泽东与湖南驱张代表团在北京进行了7次请愿活动，终于获得成功，张敬尧被赶出湖南。

在领导驱张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一直在思考改造湖南和改造中国的问题。此时的毛泽东，对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抱有很大的热情。毛泽东甚至设想，自己邀上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在里面“实行共人的生活”。

关于毛泽东这一时期的想法，他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表达的很清楚，他说：“主张群众联合，向强者做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曾对斯诺说：在那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

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

“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就在毛泽东尝试用改良的方法改造湖南、改造中国的时候，中华大地上的共产主义运动正在萌芽。早在1920年3月，李大钊就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上海党的早期组织在老渔阳里2号成立，陈独秀任书记。在上海成立的党的早期组织，实际上起到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为后来建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奠定了基础。

就在党的早期组织创建过程中，毛泽东开始与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了联系，逐步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1920年初，毛泽东在北京与李大钊、邓中夏等接触较多，还和李大钊多次讨论了赴俄留学之事。毛泽东1949年在西柏坡时讲到李大钊：“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此后，毛泽东很注意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虽然思想上开始有了转变，但他此时的关注点还在改良的问题上。5月，毛泽东来到上海，和彭璜等人在民厚南里租了几间房子，成立上海工读互助团，大家一起做工，一起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可以说，实现了他办“自修大学”的设想。

毛泽东在上海的这段时间，他多次到老渔阳里2号拜访陈独秀，两人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和湖南改造等问

题，这是他思想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毛泽东后来回忆：在上海，“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那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主义譬如一面旗子”

带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毛泽东回到家乡湖南，成立文化书社，开始推介与宣传马克思主义。文化书社经营的书刊，包括《新俄国之研究》《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等译著。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毛泽东并没有完全放弃社会改良的主张，对湖南新任督军谭延闿“湖南自治”“还政于民”的政策仍抱有某些期许。他起草自治运动请愿书，但请愿书中的要求被谭延闿断然拒绝。无情的事实迫使毛泽东冷静下来，他在11月25日给新民学会会员向警予、罗章龙等人的信中说，“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我们“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新民学会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这个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

1920年底，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积极活动下，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秘密成立。至此，毛泽东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已成为一个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自己的入党经历，毛泽东在1945年回忆：“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组织。这次大会（指中共七大）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毛泽东作为党的重要创始人，将自己创建长沙党的早期组织认定为入党之始，是合理的，而他之所以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其中的作用，无疑是最为关键的。



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审时度势，作出了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的判断，指明了下一阶段反腐败工作的奋斗目标。如何巩固发展反腐败压倒性胜利，一个重要途径是推进系统化反腐败。这次全会提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纪检监察机构改革”“一体推进追逃防逃追赃”。三个“一体推进”就是把反腐败看作一个系统工程，统筹布局、整体推进、综合发力，更加注重“治本”，构建一个科学有效的反腐败体系。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早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在实践中，面对严峻复杂的反腐败形势，如何有效遏制消极腐败的蔓延，中央采取了“标本兼治，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的策略。事实证明，几年来，在“打虎”“拍蝇”“猎狐”三管齐下的高压惩治下，有效减少了存量，有力遏制了增量，反腐败斗争从形成“压倒性态势”进而到取得“压倒性胜利”的重大成效。随着反腐败压倒性胜利的到来，既要巩固已有成果，又要着眼源头上根本解决腐败问题，必须有新的思路和策略。“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就是从侧重于治标为主，向更加注重治本转变的重要举措。

不敢腐、不能腐和不想腐，在反腐败中有着各自不同的功能，又密切相关、互相支撑。具体而言，不敢腐主要通过加大发现概率、惩处概率，增加腐败成本，产生伸手必被捉的震慑效应。不能腐主要着眼于制度建设和权力监督，从源头上堵住制度漏洞，加强权力行使过程的监督，从而减少和消除腐败机会。不想腐侧重于信念引领和法纪规制，通过坚定理想信念和增强法纪意识，从思想上筑牢抵御腐败的堤坝。没有惩治的威慑，制度难以自行发挥作用，没有思想上的自觉，再大的惩治力度、再多的制度监督也难以根本杜绝腐败。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就是把治标和治本有机统一起来，综合发挥惩治、监督、制度、教育的作用，构建一个相互支撑、相互融合的反腐败科学体系，彰显思想建党、制度治党和法纪强党的巨大威力。

一体推进纪检监察体制和机构改革。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对一体推进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国家监察体制和纪检监察机构改革，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进一步作出了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相继推行了巡

视制度、纪检体制和监察体制改革，探索党和国家监督的制度创新，监督制度不断健全完善。一体推进监督体制改革，整合监督力量，健全监督体系，将有利于更好实现监督全覆盖，整体提高反腐败效能。

对于纪律检查机构而言，就是如何更好落实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要求，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建立健全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的工作机制，以增强纪检监察的相对独立性和提高专业化水平，并通过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现纪委更好地履行对党委全面从严治党协助职责，推动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贯通协同、形成合力。对于派驻机构改革而言，当前主要是分类施策推进派驻机构体制机制创新，提高派驻监督全覆盖质量。同时，随着国家、省、市、县四级监察委员会的成立，在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统一设立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的基础上，进一步把纪检监察派驻向地方和基层延伸，不断实现派驻上下全覆盖。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就是把增强对公权力和公职人员的监督全覆盖、有效性作为着力点，把法定监察对象全部纳入监督范围，健全和完善监督体系。当然，“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监督者首先要受监督。在完善纪检监察以及巡视监督机制的同时，必须加强对纪检监察以及巡视巡察人员自身的监督，形成监督的闭环，破解“谁来监督监督者”的困境。

通过一体推进纪检监察体制和机构改革，形成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全覆盖的权力监督格局，完善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将进一步助力破解自我监督的难题，为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提供重要机制保障。

一体推进追逃防逃追赃。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高歌猛进取得的重大进展，也为反腐败取得压倒性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追逃防逃追赃”一体化推进，这不仅进一步彰显了党中央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坚定决心，而且一体推进追逃防逃追赃工作，将事先预防和事后追逃相统一，将严惩违法犯罪和积极挽回经济损失相统一，对于贪官外逃、赃款外流必将起到更加有力的遏制作用。

针对贪官外逃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早就掷地有声地宣布：“不能让国外成为一些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腐败分子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追回来绳之以法。”这次讲话正式吹响了中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的冲锋号。几年来，通过开展“猎狐”行动和“天网”行动，追逃

巩固发展压倒性反腐败胜利

□ 程鑫

追赃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显著成效。截至2018年底，百名“红通”人员已有一半以上归案，对贪官外逃起到了强烈的震慑作用，外逃人员大幅度下降，“不敢逃”的局面初步形成。要取得追逃追赃工作更大成效，还要在“不敢逃”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不能逃”“不想逃”的举措。这就需要坚持“防住一个，就等于追回一个”的理念，扎紧制度的笼子，形成有效的预防机制，让违法犯罪者逃不出去，让非法资金转不出去。一体推进追逃防逃追赃，就是着力构建“不敢逃”“不能逃”“不想逃”的综合机制，让已经逃走的无处藏身、让存心逃的无路可逃、让企图逃的丢掉幻想。

